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三十五辑】

总主编：李玉明

史学名家梁园东

杨静彦 著

梁园东（1901—1968），山西忻州市忻府区温村人，是五四以来，我国新一代有影响的历史名家。他的著作有《五代十国史》、《爪哇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外国史》（二册）、《中国现代史》、《西辽史》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家梁园东 / 杨静彦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11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 李玉明总主编. 第35辑)

ISBN 978-7-5457-0311-5

I. ①史… II. ①杨… III. ①梁园东 (1901~1968) —生平事迹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3744号

史学家梁园东

著 者: 杨静彦

责任编辑: 吕文玲

助理编辑: 薛勇强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天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32.5

总 字 数: 640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版 次: 2010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311-5

总 定 价: 80.00元 (全套2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李玉明



史学名家梁园东

主 编 降大任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01

- 一、起点，在新旧动静之间…………… 2
- 二、遭遇变局，与史学结缘…………… 9
- 三、求真与讲究方法……………17
- 四、抗战时期的辗转……………26
- 五、六一惨案与挺身抗争……………31
- 六、建国初在山西大学……………35
- 七、含冤受辱终平反……………39
- 八、梁园东著述存目……………43
 - 1. 著述辑目……………43
 - 2. 论文辑目……………44

引 子

梁园东(1901—1968),山西忻州市忻府区温村人,是五四以来,我国新一代有影响的历史名家。他的著作有《五代十国史》、《爪哇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外国史》(二册)、《中国现代史》、《西辽史》(译作,前苏联布莱资须纳德原著)、《中国政治社会史》等。他关注中国社会研究,发表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中国社会的前途》、《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实在是组织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中国民族的特点》等一系列论文;他在史学方法上有卓越见解,体现在《古史辨的史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方法》、《处理中国上古时代史料的方法问题》等重要论文中。梁园东史学著作的一大特点是,继郭沫若等前辈史学家之后,能更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史学研究方法、社会政治制度及种族、民族图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他敢于反潮流,对当时古史辨派的流行史学风尚进行严肃的批判。这与现今学界拨乱反正的说法不谋而合。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梁园东先生就能抓住古史辨派错误的要害,对“疑古”思潮予以有力的诘问,说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本文将简要介绍梁园东先生的生平和史学贡献。



一、起点，在新旧动静之间

梁园东出生于世纪之交的 1901 年，此时的清王朝国难频仍，严复说，中国社会“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李鸿章也说，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此同时，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转型”（汪丁丁）。

然而，不管今天的我们用怎样宏大的叙事去观望历史，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都永远在继续，生老病死的人生不断轮回，也许，多少年之后，仍然会有在那个时代懵懂未觉的记忆让我们慨叹，生活的存在有太多的奇幻与诡谲。而这一年对于山西忻州温村的梁氏家族而言，就是在家谱上新添了“梁佩衮”的名字，这就是 1927 年之后的“梁园东”。

添丁生子永远都是幸福的事情。梁佩衮（梁园东）出生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不知是在春夏秋冬的哪个季节，也不知是子丑寅卯的哪个时辰，为了他的到来，母亲经历了怎样的阵痛；听到他的哭啼，父亲又在心头掠过怎样的欣喜。所有的细节都被淡忘。

无法找到对于梁先生母系一支的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有关梁园东父亲的记载，在姚奠中先生为梁园东先生写的小传里说：

他的父亲梁际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太原起义。清朝末年梁际蓉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民国建立，阎锡山控制了山西的军政全权，排斥异己，他只担任了几年榆次县的知事，就弃官从事蚕桑实验，在太原开设销售商店。这个商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就成了他支持儿子梁佩袞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掩护据点。梁际蓉的思想和行动，深受当时中国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对青年时期的梁佩袞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在不足两百字的短短的一段话里，“革命”一词出现了三次。这个充斥着正义色彩的词语，对于上世纪初叶的中国有识之士而言，应该是一种褒奖。在当时，这种实现正义和恢复公平的行为既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然而，革命不是由那些头部还埋在污泥中的人发起的，而常常是由那些刚从污泥中抬起头，举目四顾，注意到别人比自己生活得好，而且认为整个制度对自己很不公平的人发起的。也就是说，革命是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对一个不公平的制度的反抗。

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应该是引领梁际蓉先生人生道路的航标。在后来，梁园东先生比这走得更远，作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用实践验证了自己的革命的一生。这也许与其父亲的基因遗传有关。在梁园东先生的一生的生命信息里，都体现着父亲梁际蓉变革现实的思想的影响。

革命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戛直的行动，思想的先驱



性导向了革命的必然，而先驱性的思想如果没有对于过去历史的明了与感触，它的存在几乎就成了无本之源。在这里，梁佩袞在童蒙时期所受的教育成了他后来倾向革命的基因。

早期的启蒙阶段的教育是一粒深埋在地下的种子，它究竟是怎样发生、发展、壮大，这里面究竟隐藏了多少对于一个人的将来的成长难以预料的信息，这些信息怎样的在未来的日子蓬勃地涌动在人体的血液里，不经意间在某一个必然或偶然的时刻改变人们的命运。这里面饱含着神秘的东西。当我们看到人成熟后所结出的或大或小的生命的果实，就会不禁产生追本溯源的冲动。

对于他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姚奠中先生讲道：“梁园东上中学以前，在家乡读私塾，受教于叔祖前清秀才梁歌九，熟读了四书五经，打好了阅读古籍的基础，为后来研究古史准备了初步条件。”

私塾？是的，传统教育的温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两千余年延绵不衰。据说，最早关于塾的记载出自商代甲骨文。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的得名据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

“塾本以熟思”，私塾教育下的梁佩袞的确是一个对于古代文化能够在精读的基础上加以熟思的人。从梁佩袞先生出生的1901年起，到1910年的十年间，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私塾教育步步改良。1901年，清廷下

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梁佩袞幼年时期所学的书籍或课程的具体有关资料，梁家的私塾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对改良进行了呼应，不得而知，但是，当我们翻开《史学论文集》时，我们除了慨叹梁佩袞的天赋，还不得不对其叔祖梁歌九表示敬意，可以肯定这位饱读诗书的儒者的悉心教诲，是梁园东先生日后的学术成就的根基。

孔子说“吾年十五而志于学”，15岁的梁佩袞从忻州老家来到了省城太原，他在四年中学期间，节衣缩食，刻苦攻读。他对书籍特别爱好，经常出入于新旧书店，广事搜购，旧书是其所爱，新书更不放过。很快他家便成为周围藏书最多的人家。对于书籍而言，物质上的占有永远都不是目的，可没有物质上的占有，却永远都达不到目的。字是要一个个的去读的，就算是一目十行，也得有纸张的承载；思想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一个从懵懂逐渐走向成熟的少年来讲，在哪个方向或者在哪个层面投注自己有限的财力、物力、精力，决定了他成长的方向与成长的高度，这是生命的营养。所谓“营养”，其实就是“经营养料”，一个人能够更早地、更有效地经营自己生命的养料，就会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梁佩袞就是这样一位



善于经营自己生命养料的人，所以在 1920 年，初中毕业的梁佩袞已经成为一个学识相当广博的青年。而这一年，也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个阶段，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隔了 90 个年头，我仍能设想 20 岁的梁佩袞在踏上北上的求学之路时的踌躇满志，当然也许不只是踌躇满志，更也许什么都不是。那么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小伙子，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定位来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在这个阶段，又遇到了人生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当他第一次站在北大红楼面前，对着“国立北京大学”这几个大字的时候，眼睛里闪现着的光芒有着怎样的繁复内容，我们无法推测。

从 1920 年到 1926 年，在将近六年的漫长的时间里，梁佩袞与北大朝夕相处。在未名湖畔诸多莘莘学子或神采飞扬，或庄重严肃，或机敏佻达，或激情澎湃的身影里，也裹挟着这位“沉静好学”的青年。而北大老师们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也深深地感染着这位年轻的学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始终秉承着志在天下的严峻思想，这种思想滋养了梁园东刚正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他的身上凝注了北大特殊的精神魅力。

在北大预科学习了两年之后，梁佩袞进入哲学系就读。

北大哲学系始建于 1914 年，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创建之初为北大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1919 年更名为哲学系。在校史上，著名学者蔡元

培、胡适、蒋梦麟、熊十力、唐钺、邓以蜚、汤用彤、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沈有鼎、洪谦、张岱年、胡世华等先后在这里执教，培养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摇篮。

其时的北大，正值著名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校长之际，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日新月异的北大由于吸引了陈独秀、李大钊、朱家骅、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学界精英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故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

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就是马克思主义。身处其中的梁佩袞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这种思潮。这种接触点燃了23岁的梁佩袞心底燃烧的激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奠中先生在《梁园东教授传》里写道：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人物倡导下，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很快，另一方面以胡适为首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则与之相抗。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即是焦点。梁园东是一个热情、刚正、有抱负而又沉静好学的人，一开始他接受了胡适的一套，潜心读书，但面对北洋军阀统治下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他一天比一天更深刻的认识到，静坐书斋，潜心读书的生活显然并不适合当时的社会，要想更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体现人生价值，必定要有更正确的选择。



所以，当他一接触到共产主义，一下子就看见了前途。梁园东后来回忆说，马克思主义使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北大求学的第三年，经共产党员王壮飞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年十月，他在《大夏》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十年来之中国外交》，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关切和对军阀卖国外交的愤慨。

梁园东就这样掀开了他人生的最为重要的一页：成为共产党人，投身革命。

应该说在北大度过的六个年头，是梁佩袞一生的关键点，作为他人人生路上必经的一站，北大给了他选择的机会。无论如何，选择都是一种机遇，与命运有关，与未来有关，与成败有关。有时候，也和亲情有关。

若干年后，梁园东先生回首1926年到1927年的这段时光，内心里会怀着怎样的莫可名状的情愫；当他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又会在心底泛起怎样的波澜。

1926年，梁佩袞在北京大学毕业时，正值大革命高潮到来，他被党组织派到武汉，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又被派回太原，任国民师范教员。在他父亲梁际蓉的支持下，以父亲的蚕桑销售商店为据点，开展党的组建工作。他是当时山西党的负责人之一，除一般组织宣传外，主要负责财务工作。这期间，他和梁春霆、赵镜如、续俭等人，筹办出版了《滂沱》杂志。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名为文艺，实际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发行了四期。与此同时，他组织了“滂沱社”，吸收进步青年，以进山中学学生为主，发展到百余人，成为当时和

后来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了反动的“清党委员会”，镇压共产党。被搜捕的梁园东，由续俭等人掩护，逃离太原，只身赴上海。而他的父亲却和梁春霆、赵镜如先后被捕，扣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赵镜如死于狱中，梁春霆遭监禁一年后被保释。他的父亲在被羁押半年后获释，但因受折磨而得不治之症，几年后于穷困中死去。

人生就是这样，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拨弄着，意气风发也罢，踌躇满志也罢，身陷囹圄也罢，背井离乡也罢，都只是翻云覆雨的刹那，尽管有必然，但承受的时候，所能接受的只是偶然。因为偶然是和亲情、和自身、和小我息息相关的，而必然却需要那种跳到五行之外的达观和洞若观火的智慧。

二、遭遇变局，与史学结缘

1927年秋天的上海，对于刚刚更名为梁园东的梁佩袞来讲，心情是沉重的。他无意体会“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傲岸，也不能欣赏“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景色。至于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弥漫在空气里的靡靡之音，在这位刚刚经历了理想的挫败而显得迷茫与苦闷的青年看来，更是有着隔山探海般的遥远。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对梁园东来讲，展现不出乐园的风采。冒险家们要的是一己的饱满，而革命者追求的是社会的安定和民族的复兴。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在这里，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租界以外的地区控制在孙传芳部的军阀势力手里。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是从这里开始的。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当时也设立在上海。而三月间刚刚发动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党应该就在这里。

然而，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党组织被迫转入了地下。梁园东打听不到党的消息，找不到党的踪影。没有了组织的引领，他踟躅在闹市的街头，茫茫人海中的梁园东像是一叶飘零在江湖上的扁舟。此时的他是否在心里产生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念头，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的诸多文人来讲，这也不失为一种挫折之后的人生选择。士大夫阶层的超脱与逃避，有时候的确可以化解心头失意的人们心头的懊丧，但对于精神上有着自我振作功能的、更强悍的灵魂来讲，他们更愿意凭借自己的力量打造下一次的崛起。

荷兰名史家慧辛迦说过：“对于历史而言，问题永远是：‘向何处去？’。”而今的梁园东也很想明白，中国的历史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为了寻找答案，梁园东“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知道的还很少”，故而“转向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系统研究”，他要从历史当中寻找答案。

对于学者气质更为浓郁的梁园东来讲，这当然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早在1902年新史学发轫之时,梁启超就撰文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之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也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这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最后,他下结论,倘“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20多年之后,这席话成了梁园东先生身体力行的圭臬。还历史以真面的企图,以近乎狂热的姿态楔入梁园东先生的学术追求。20年代末期,他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浦东中学任教,及在大东书局任编辑,最后在大夏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期间,他除编著了高初中历史课本外,在1930年前后出版了《五代十国史》、《中国文学史》、《爪哇史》,1933年前后世界书局又为之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外国史》(二册)、《中国现代史》,而他的译作《西辽史》(前苏联,布莱资须纳德原著),则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重版。

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梁园东史学思想的日趋成熟,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开始思考,同时在各文史杂志上连续发表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性质,同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进行了论战。他在极力地探寻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出路。以回望的姿态,用一种力透历史纸背的方式想要在帝国曾经经验过的文明与野蛮、辉煌与不幸中抽丝剥茧般地寻找规律,以求指导实践。

从1927年到1937年,在上海的十年时间里,梁园东



先生先后发表了 30 多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社会性质、社会基础、史学方法、民族特点、古代地理、古代交通、门阀制度、教育制度、种族问题、土地制度、战争形式、专制主义等方方面面。

革命风起云涌，今天的学校教授的中国历史用最精简、最概括的语言描述了十年间的大事，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较量是贯穿这段历史的主线。在一系列的起义、一系列的围剿和反围剿背后，历史，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正用他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对未来中国的前途作着选择。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和历史更接近的智者，在风云变幻的局势面前，用自己特有的机智和敏锐，以更为直觉的方式体察着中国这具饱满的生命体，在遍体鳞伤之余所发出的强劲呼吸。

的确，在革命面前，有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有的人谋划筹措、机智果敢，有的人豪情万丈、指挥若定……而革命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缺失，对革命来讲，都不只是遗憾，甚至是失误。文化方面的革命又怎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缺失？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写道：

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昔人于此，观念虽未精莹，亦未尝毫无感觉。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

对于一个以革命为己任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拿起手中的笔，运用自己的智慧，为时代找寻前进的理由和方向，更为重要的事？

原本就沉静好学的梁园东在此时显示了一个具有大家风范的史家的气度，他所撰写的论文从宏观的角度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普及，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原理，小的方面，在升学、求职等重要的人生站点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而言之，在国家发展、党的建设、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等宏观的历史进程里，扮演者无可替代的角色。可是在共产主义发轫之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坚持却要抱着一种舍生取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思想是如此的先进，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对它的传播有着极端的恐惧。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陈独秀，一生当中先后被捕五次，最后一次在上海被捕，蒋介石谓“陈独秀等系犯‘危害民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27年4月27日被捕，次日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刽子手以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秘密杀害……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如此“讨赤”》中这样写道：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



临北京之空中，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可见“赤化分子”，即被“共产主义思想同化的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处境和遭遇。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共产主义者仍然会执著前行，前仆后继。

由于梁园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运用社会发展的观点思考问题，他在《中国社会的前途》、《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民族的特点》、《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等一系列论文中，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社会的组织问题（即制度问题）等方面，都提出了真知灼见。

他认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直至当时，本质上改变很少”，“最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的侵蚀，中国社会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但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成为半殖民地社会”，“出路只有从救济农业入手”（见《中国社会的前途》）。

针对一些人拿欧洲史套中国史的现象，他明确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见《中国社会的基础》）。

针对一些人认为秦、汉以后中国已不是封建社会的说法，他说“秦、汉以后，仍然是封建国家”，“官吏制度、郡县制度是行使封建权力的另一种方式”（见《中国社会的基础》）。

他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半封建的制度之下，产业实无发展的可能。要打开这种困难，除非用